

# 于右任的农学情怀

王东明

很多人都知道于右任是革命家、书法家、诗人，却鲜有人了解他同时还是近现代伟大的农学教育家。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展出的《于右任书创办斗口试验农场宗旨碑》，引发了人们对于右任农学情怀的探究。

## “创办斗口试验农场宗旨碑”

在2021年“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推出了“陕西高校博物馆馆藏碑石拓片珍品展”，其中《于右任书创办斗口试验农场宗旨碑》最为引人注目。碑文如下：

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口村农事试验场，所有天地，除租遣外，皆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本场无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固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长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

右任，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

从碑文介绍可知，于右任创办斗口村农事试验场，筹建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提议十年万井计划等农业教育实践，以经世致用为特征，富有创新性和时代感，是其农本观念、悯农意识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我国西北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具有拓荒、奠基作用。

史载，在农业职业教育领域，于右任曾提出“改良农业，恣家生产，作示范之用”，“虽当从事开垦，讲究农业”等观点，他曾在泾阳兴办斗口村农事试验场，免费向农民传授技术，供应良种，又在三原建立东段农场，改良农业，推广农林新技术。于右任1934年请上海建筑工人在农场修建了一幢487平方米带地下室的小楼，他亲笔书写办公宗旨，请长安王尚玺刻石，镶于第二办公室前壁，一直保留至今，就是这块“创办斗口试验农场宗旨碑”。这通石碑至今仍立在斗口村农事试验场院内。

## 创办西北农专

在《西北农林》创刊号上，首篇《本校在武功筹备以来之情况》一文有这样一段话：

本校创立之意义，迭经国内各报章刊布，谅早为各界所洞悉；惟其创立之经过情形，则有非一般社会人士所明了者。溯筹备工作之发端，厥为本校筹委会之组织，其产生及经历，并日校史中自当详及之，兹不多赘。惟筹委会设于首都，诸凡进行，每感不便，民国二十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401次会议批准于右任为西北农专校长的文件

二年七月，遂由筹委会戴季陶、于右任、张溥泉三常务委员，电聘王玉堂先生为本校筹备主任。王应聘后，即于武功成立筹备处，秉承筹委会意旨，积极设施一切。二十三年三月，筹委会又公推于右任先生为校长，于以事实关系，虽未到校就职，而一一应工作计划，仍以常务委员名义，指挥进行。时光荏苒，屈指已两再零九阅月，各部工作，业已大体就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是1934年由于右任和杨虎城创办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6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4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当时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是西北地区最早的高等农林教育学府。学校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肩负着建设西北、兴学兴农、培育英才的历史重任。可以说没有于右任当日的奔走呼吁、精心策划，就不会有当初的西北高等农林专科学校，也就不会有今日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建于1932年。1928年至1932年，陕西连续5年遭受大旱，据史料记载，八百里秦川死亡灾民达300万，外出逃荒者达40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华民族危机四伏。长期的革命实践，使于右任清楚地认识到：“治贫先要治愚”；中国要想强胜还得走“以百年树人之计，植民族复兴之基”教育救国、科学治农的道路，创建农业院校，培养农业人才，研究农业问题，对开发西北尤有深远意义。

于是，于右任以他社会活动家的广泛影响和教育家丰富的办学经验，奔走



于右任审阅西北十年万井计划之真谛给沙玉清的回信

呼吁、精心策划，终于使凤凰变成现实。

1932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成立了以于右任为首，由各方人士组成的“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

在以后的几年里，于右任与杨虎城为学校亲自勘探校址，为学校筹集经费，遴选教学、管理人才。1934年学校在张家岗上隆重奠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终于成立。1934年3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401次会议决议，委任于右任为西北农专校长。

在西北农专筹建过程中，于右任非常强调调查、实践等办学条件的重要性。他认为：“办学条件不备，遂使贤能却步。即使勉强留住人才，也是人才、经济与时间的浪费；农场、林场、牧场等附属场所也是办学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附属场所（农场、林场、牧场）未完成，不宜开办本科；即使不开办本科，农场、林场、牧场等亦万不能不备。”并提出：西北农专的筹建要优先成立各重要研究所及聘定专家，并迅速开办农林场。在筹建场站的同时，学校同时开始了科学研究。

于右任高度重视学生的田间实践环节。1935年6月上旬，于右任电令国立西北农专：

近因值收麦期间，特停课一周，俾学生实地练习统计试验、田中获麦等，并将此项练习即做学生成绩，当即令飭高取遵办矣。

正是于右任“先建场站，后建系（组）”的筹建思想及对学生田间实践的

高度关切，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国立西北农专办学理念，延续至今，学生获益极多。

1936年7月，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工作结束，于右任卸任校长一职。

## “十年万井”计划

卸任西农校长后，于右任仍然心系西北农业的发展。1941年夏，于右任视察西北后，萌生“十年万井”计划，以救西北之穷，谋西北之利。

1942年8月1日，中国工程师学会在甘肃兰州召开中国工程师学会暨各专门学科联合会年。于右任将该计划电达大会供研究、讨论：

去岁视察西北后，草有十年万井计划，实有补助渠工之不及，拟先由甘省试办，渐及他省，意谓救西北之穷，谋西北之利，此事则切而有效，轻而易举。十年计划之历程，第一年专事筹备，即训练人才，预备机械，勘测水源；第二年开始试凿，以二十口井算起，无论全新式半新式或坎儿井式，必须合于标准，此后以数学级数推算进行，而经验技术机械人才以及地方人民之参加者，亦当逐年加多，为之指导辅助，实行普凿，至第十年全计划必可告成。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于先生提出的“十年万井”计划是一项切实、有效、易行的西北水利补助工程，旋即成立西北区“十年万井”计划研究会，任命国立西北农学院水利系主任沙玉清为主任委员，并委托该研究会会同国立西北农学院负责实施。

（作者系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中，徐志摩爱屋及乌，将写于1926年的著名诗歌《偶然》（发表于同年5月27日《晨报副刊·诗铤》第9期），巧妙地嫁接过来，作为人物“老瞎子”的唱词，令人回味无穷。

《卞昆冈》后来发表在《新月》1928年4月第1卷第23号上。7月，又由新月书店出版单行本。

1928年5月，《卞昆冈》由青岛“光明剧社”搬上话剧舞台。“光明剧社”是杜宇（时任《青岛民报》总编辑）、王玫（中国第一把小提琴制作者）、王卓（青岛市立中学美术教师）等数位文艺青年发起成立的青岛第一个话剧表演团体。经过紧张有序的排练，话剧《卞昆冈》在新舞台大戏院（后更名为大舞台、光陆大戏院、新新大戏院、永安大戏院）上演，由杜宇导演，王卓负责舞台美术布景制作，王玫担任现场音乐伴奏，它也是青岛观众第一次欣赏到以西洋乐器小提琴伴奏的话剧演出。舞台上的演员虽非专业出身，但剧中人物塑造真挚质朴，剧情演绎流畅自然，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演出是“光明剧社”成立后的首度公演，门票免费赠送，观众以青年学生为主，纯属公益和实验表演，尽管只演了一场，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卞昆冈》这部由“浪漫情侣”徐志摩、陆小曼联袂创作的剧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未有任何艺术团体进行排练和公演。倒是在1934年，《卞昆冈》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由导演王元龙执导，雪明珠等主演，时长90分钟，在当时引起了一番不小轰动。

## 钱锺书的“痴气”

沈治鸿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记录了钱锺书充满童真童趣的逸事，钱家人称其“痴气”十足。钱锺书被誉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他的“痴人痴事”，让我们真切地看到旷世奇才闪烁的斑斓人性和别样人生。

读小学时，一次雨天上学，看见路上许多小青蛙跳跳，觉得好玩，就脱下钉鞋捉来放在鞋里，抱着鞋光脚走到学校。进了教室，就把盛着小青蛙的钉鞋放在台板桌上。上课的时候，小青蛙跳出来，满教室蹦。同学们见状窃窃笑乐，老师弄清缘由，把他拉到讲台边罚站。

那时的鞋不分左右，钱锺书小时候他也分不清左右。后来到苏州上美国教会开办的桃坞中学时，开始穿皮鞋了，他还是左右不分乱穿。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令。钱锺书因为英语好，当上了班长。可他嘴里能用英语喊口令，列队行走起来两脚却左右不分。当了两个星期班长的钱锺书就被老师罢免了，他如释重负。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钱锺书午睡，杨绛就临帖。一次困倦来袭，钱锺书睡着了。钱锺书醒来见状，就饱蘸浓墨，想给杨绛画一个大花脸，刚一落笔杨绛就醒了。哪知道杨绛快把脸洗破了，也没有洗尽墨痕，钱锺书以后再也不要这样恶作剧了。回国后，在外地教书的钱锺书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小女儿正在熟睡，便在她肚子上画了一个大脸，他母亲发现了，对钱锺书一顿训斥，吓得他不敢再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清华大学任教的钱锺书养了一只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钱锺书设法把猫救了下来。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他手腕上一搭，似在表示感谢。钱锺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喜爱它。小猫长大了，半夜常与别的猫打架。钱锺书就特地准备一枝长竹竿，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一听见猫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翻身而起，拿起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猫。其实，那是邻居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杨绛怕因猫伤了两家人的和气，就引用钱锺书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钱锺书笑着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 李济的规矩

刘浪

李济，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先后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等遗址发掘。其中，安阳殷墟的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将我国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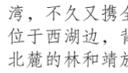
1924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合作考古。李济反复考虑，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二是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毕士博回信：“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1928年12月初，李济履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他与同仁约定：一切古物归公，私人不得收藏古物。他说，考古工作者若收藏古物，谁知道你是从哪里自己买来的，还是私吞的考古成果呢？遵守这条规定，可使我们避免“瓜田李下”说不清楚，也有助于取信当地老百姓，让他们明白“考古不是挖宝”。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李济进一步强调：“一切地下的古物完全是国家的，任何私人不能私藏……”

有一次，一位商人拿一块准备出手的古玉，登门请李济鉴定。李济问他是为公还是为私：“如果是为私，我非珠宝商人，不能鉴定。”李济后来跟别人说：“那块玉确为汉玉，我若为他做了鉴定……我收了钱，却丢了考古界的人格。”

李济一生经手发掘和研究保管的文物无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在书房见到5只木猴子，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赠的两三件仿制艺术品，没有一件古董。

李济一生不蓄私、不徇私，始终遵守当年订立的考古规矩，为后辈们树立了榜样。



## 丰子恺一联三人写

冯忠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丰子恺由大后方回到了故乡——浙江石门湾，不久又携全家迁居杭州静江路（今北山路）的一所平房。此屋位于西湖边，背靠葛岭，旁边是招贤寺，而寓所的大门正对着孤山北麓的林和靖放鹤亭。当夕阳西斜时，他经常站在家门口石阶上眺望远景。一天，他触景而发，不假思索地吟了一句：“门对孤山放鹤亭。”话一出口，便觉得这无意说出的句子，倒是一句很好的对联，但是，一时却对不出上下联，就“暂付阙如”了。

几天后，上海开明书店的经理章锡琛来访，得知还缺少一联，便帮他出了一个：“居近岳庙招贤寺。”虽然尚属工整，但一句中庙有寺，犯了规格，觉得不妥，两个人又想不出更合适的字词来。章锡琛回到上海后，把这副对联送叶圣陶过目。叶先生也熟悉杭州风景，就把“岳庙”改成“葛岭”，使这一联面目一新，变成了“居近葛岭招贤寺”。经过他们三人的改写，就成了这样一副对联：

居近葛岭招贤寺  
门对孤山放鹤亭

这副对联对仗工整，在对联中应算上乘。有了一副好对子，又是三个人合作的，本该挂在门口，可丰子恺不敢。为什么呢？他说：“我怕游客看见这对子，误认为这里也是风景点，天天有人到我家参观游览，我可就受不了啦！”



## 姚雪垠说日语

周二中

1979年，现代著名作家姚雪垠参加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负责人周扬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当时国门尚未正式开启，中国作家访日也是一件新鲜事。姚雪垠是1910年生人，当时近70岁了，他老人家自告奋勇地想学几句日语以方便与日方交流。于是工作人员教了几句简单的日语，比如别人为你提供了服务，你要表示感谢，就说“毛豆毛豆”。

一次，日本友人为姚雪垠斟酒，他老人家赶忙起身，不住地用日语表达感谢。但很奇怪，他越说，人家越不停地倒。姚雪垠瞪大眼睛，忙问翻译是怎么回事。翻译一听，乐了，说您老说反了，说成了“毛豆毛豆”，而“毛豆毛豆”的意思是“再来点、再来点”，所以人家就没完没了地斟。

同桌人一听，笑得前仰后合。姚老挠了挠头，从此不再对日本友人说日语了。

## 徐志摩陆小曼写话剧

周惠斌

1926年10月，诗人徐志摩和才女陆小曼喜结连理。婚后，陆小曼沉溺娱乐、醉心玩票、热衷交际，生活用度频频告急。

徐志摩深知爱妻艺术修养不凡，为激发陆小曼的写作兴趣，陶冶生活情操，将她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便提议联袂创作一部剧作，共同书写他们的艺术情思。不久，由陆小曼提供故事素材和剧本大纲，徐志摩执笔的剧作《卞昆冈》，在两人精心构思、修改、完善后，终于瓜熟蒂落。

剧本《卞昆冈》共5幕，人物11个，剧情受当时西方象征剧，尤其是意大利戏剧的影响较为明显。因为在此之前，徐志摩和陆小曼分别翻译过意大利戏剧《死城》《海市蜃楼》，且都钟爱西方戏剧和舞台表演。

《卞昆冈》的主要内容讲述：艺术家卞昆冈在云冈山石窟从事石佛维护和雕刻，与妻子青娥有着刻骨铭心的爱情。妻子病故后，他同老母和幼女阿明相依为命，但他一直不能忘怀对亡妻的怀念。阿明有一双酷似青娥的美丽双眸，这使他每每看到孩子就想到亡妻。为照顾孩子，在母亲撮合下，卞昆冈娶同村寡妇李七妹为



《卞昆冈》徐志摩 陆小曼著 新月书店 1928年版